

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二



《資治通鑑》叢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K204.3



200311019

3

《資治通鑑》叢論

刘乃和 宋衍申 主編

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二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我国史学界近年来研究《资治通鉴》这一史学名著的论文集。共收论文十七篇。这些论文，从不同侧面、不同角度对《资治通鉴》编纂的历史背景，编纂宗旨，编纂者的政治、学术观点及编纂的基本方法，《通鉴》的主要内容、史学价值及其对后代史学的影响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分析评述。可供史学研究工作者、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。

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二

《资治通鉴》丛论

刘乃和 宋衍申主编

责任编辑： 张继红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 11.625印张 267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980册

统一书号11105·84 定价2.45元

前 言

明年（1984年）是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九百周年，我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编写了这本《〈资治通鉴〉丛论》以为纪念。书中收文十七篇。文章是从不同角度对司马光和《通鉴》的论述，其中对同一问题的理解、评价及《通鉴考异》引书数字等各有异同，今一并收录。参加撰写的有杭州大学、兰州大学、辽宁大学、山西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北京师大、东北师大、华中师院、吉林师院、广西师院、福建宁德师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十几位同志。本书组稿、联系、编辑等工作，东北师大宋衍申同志负责为多。

刘 乃 和

1983年11月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刘乃和
---------	-----

《资治通鉴》研究概述

——为《通鉴》修成九百年而作（代序）·····	宋衍申（1）
《通鉴》编修分工及优良编纂方法·····	仓修良（46）
《资治通鉴》修成的原因·····	张孟伦（64）
《资治通鉴》与编年体·····	林校生（79）
《通鉴》书法散论·····	许凌云（95）
《通鉴》的战国史学·····	陈连庆（112）
兼容并蓄 百虑一致	

——《通鉴》治战国政治史的一个原则·····	陈抗生（130）
略谈《通鉴》对农民起义的记载·····	周文英（150）
记黄巢起义事，《通鉴》优于新、旧《唐书》说	

·····	崔曙庭（161）
张氏《通鉴学》所列《通鉴》引用书目补正·····	陈光崇（173）
《通鉴》参据书考辨·····	高振铎（183）
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·····	施 丁（203）
试论“臣光曰”中可供借鉴的因素·····	刁书仁（244）
《通鉴》著者司马光·····	罗元贞（255）
重读《通鉴胡注表微》札记·····	刘乃和（264）

关于《资治通鉴补》 宋衍申 (302)

刘攽年谱 颜中其 (323)

附

建国以后《资治通鉴》研究论文目录 (止1982年)

..... 丹 凝 (362)

《资治通鉴》研究概述

——为《通鉴》修成九百年而作

(代 序)

宋衍申

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(公元1019—1086)和他的助手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、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。全书二百九十四卷,约三百多万字。所记历史断限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)下迄后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),记载了包括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在内的十六个朝代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。

对《通鉴》这部大书,历代都有相当高的评价。

宋神宗说:“前代未尝有此书,过荀悦《汉纪》远矣。”^①

南宋朱熹说:“温公之言,如桑麻谷粟。”^②

宋末元初,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

① 毕沅:《续资治通鉴》“元丰七年十二月”。

② 朱熹: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。

则上无以事君，下无以治民。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谋身必至于辱先，作事不足以垂后。”^①

明胡应麟说：“自司马之为《通鉴》也，汉、唐而上昭昭焉；自《通鉴》之止司马也，宋、元而下泯泯焉。”^②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。”^③

清王鸣盛说：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。”^④

民初梁启超说：“简繁得宜，很有分寸，文章技术，不在司马迁之下。”^⑤又说：“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”^⑥

近人岑仲勉说：“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，论到编纂的方法，史料的充实，考证的详细，文字的简洁，综合评论，确算它首屈一指。”^⑦

这部书是司马光与其助手用了十九年（周秦纪八卷为司马光所自修，不包括在内），呕心沥血所编成，最后完稿是公元一〇八四年（元丰七年），到一九八四年，已经修成整整九百周年了。这九百年间，《资治通鉴》一刻再刻、广为流传，早已不只是封建帝王“资治”之用的专有品，而变成普及于世的中国历史书籍了。研究《通鉴》的学者更是风起云涌，代不乏人；《通

① 胡三省：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。

② 胡应麟：《史书占毕》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）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史部·编年类·资治通鉴》。

④ 王鸣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百。

⑤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（补编）》。

⑥ 梁启超：《新史学》。

⑦ 岑仲勉：《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》“自序”。

鉴》及其有关的著作的研究，已成为学术界一项专门的学问了。

研究《通鉴》的学者。最早当推北宋的刘安世，他是《通鉴》下杭州镂板时的“校对宣德郎”，曾作《音义》十卷，而世不传。其次就是他的同代人刘义仲（壮舆），刘义仲是《通鉴》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（道原）的长子。他未见过司马光，但从其先人那里了解许多司马光与刘恕讨论编修的情况，他据此而作《通鉴问疑》一卷。全书仅六千多字，共讲了三层意思：一、二层选载了刘恕与司马光往还问难之语，三层是附录一封刘义仲给范祖禹的信，刘义仲在信中举出八条疑问向范祖禹请教。从《问疑》中可以看出：一、修《通鉴》过程中，司马光与其助手关于正闰问题有过争论。刘恕曾以蜀比东晋，拟绍正统，司马光则不同意。二、司马光向刘恕的发问，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事，后代学者在讨论编修分工时，以此做为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“长编”的佐证。三、所列八条疑问，以矛攻盾，指出了《通鉴》的一些纰漏：（一）《通鉴》于薛包茅容，尚具述事迹，屈原与日月争光，独不见书；（二）《通鉴》于荀孟二贤，备书其语，而乃不次其传；（三）《通鉴》若言有统，不当分南北朝为帝，若言无统，不当书南北朝为主；（四）《通鉴》不书符瑞，而书高祖斩蛇；（五）《通鉴》不书神怪，而书寇祖仁藏金；（六）《通鉴》不书过褒之事，而书荀淑比叔度于颜回；（七）《通鉴》不书过贬之事，而书王凝之借鬼兵；（八）《通鉴》不以传疑为实然，而书冯太后鸩显祖。四、司马光与其助手在编修过程中。虽有分歧，但还是同心协力共成此书的，而刘恕“功力最多”^①。

^① 刘义仲：《通鉴问疑》。

后于刘義仲的晁说之（以道）也是一位早期研读《通鉴》的学者，晁氏生当北宋之交，慕司马光，推尊《通鉴》，又与司马康（公休）、刘義仲交往甚密，所以对《通鉴》编修情况多所了解，在其《嵩山文集》卷十七中的“送王性之序”和“‘长编’疑事”两条中，保存了《通鉴》初期编修分工，史料来源和刘恕编修“长编”情况的部分材料。《通鉴》初期分工与后来分工曾有不同，引起后代学者关于分工的争论。

《通鉴》修成已是北宋末年，所以北宋时期还来不及对这样一部巨著进行深入地研究。

南宋时期则不同了，《通鉴》研究学者接踵而出，研究《通鉴》成了学术界的一件盛事。依其研究的特点，我们可把当时的《通鉴》学者队伍分成三支：一支是以李焘、李心传、刘时举为代表的续《通鉴》学者；一支是以朱熹、袁枢为代表的改编《通鉴》学者；一支是以史炤、王应麟、胡三省为代表的注释《通鉴》学者。

续《通鉴》学者李焘（字仁甫，号巽岩，一字子真），为宋政和，淳熙间人。所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是续《通鉴》而作的北宋一朝的编年史著作（今本是修《四库全书》时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缺神宗、哲宗两朝的一部分和徽、钦二宗两朝全部），《百官公卿表》的熙宁以前部分仍司马光所著《百官公卿表》，以后为李焘所续。

从李焘的续作我们可以看到：

（一）李焘深得《通鉴》编纂之法。他在乾道四年（公元1168）进建隆元年迄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《续通鉴长编》稿时说：“臣窃闻司马光之作《资治通鉴》也，先使其僚采摭异闻，以年月日为‘丛目’，‘丛目’既成乃修‘长编’……‘长编’宁失于繁，无

失于略……臣今所纂集，义例悉用光所创立，错综铨次，皆有依凭，顾臣此书诂可便谓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姑谓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可也。”①

（二）继承司马光修史“资治”的目的。司马光之修史是为了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懋稽古之盛德，跻无前之至治。”②李焘修《长编》也是“每恨学士大夫，各省所传，不考诸实录、正史，纷错难信”③，因而要“破巧说伪辨之纷纭，益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”④。

（三）司马光修《通鉴》不似宋初王钦若等编《册府元龟》那样，只据正史，少及其它。《通鉴》除正史外，还旁及杂史小说三百二十二种，这种广泛征集材料以成信史的史料观，也为李焘所继承，李焘明确表示《长编》也是“旁采异闻，补实录、正史之阙。”⑤

（四）司马光助手们所作的“长编”，今天已不可见，《续通鉴长编》可以反映出《通鉴》“长编”的大致模样；同时在李焘的“进表”中所多次谈到的司马光和《通鉴》的一些情况，也是我们据以研究《通鉴》的可贵材料。

李焘是研究《通鉴》并效法《通鉴》而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一人。

南宋一代，以《通鉴》义例著史的李心传（微之）著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二百卷，（亦自《永乐大典》辑出），其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；刘时举著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十五卷，述南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近百年史事。这些史家的史著都是《通鉴》研究的直接成果。

①③④⑤ 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“经籍二十”。

② 司马光：《进资治通鉴表》。

改编《通鉴》学者朱熹（字元晦、仲晦，晚号晦庵），对《通鉴》有推崇又有批评，改编《通鉴》而创《通鉴纲目》五十九卷。他对《通鉴》的批评意见主要是：（一）《通鉴》于正统不明，三国时以魏为主是“其理都错”^①。（二）《通鉴》记年皆以后来为定，不合理。（三）司马光修书，爱憎由己，“凡与己意不合者，即节去之”^②。（四）司马光对才德之论不全面，“温公论才德处未尽，如此则才都是不好底物矣”^③。（五）“唐五代多繁冗”^④。总之，在朱熹看来做为“资治”之用的《通鉴》，不是尽善尽美之作，尤其在“正统”问题上，朱熹站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的立场上，是不能同意“帝魏寇蜀”的。除此之外他也感到《通鉴》做为帝王的历史教科书，仍然太详，而《资治通鉴目录》又太简。司马光晚年似乎察觉到了这一问题，做《举要历》又未成，南宋胡安国修《举要补遗》若干卷，又“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。”^⑤所以，他自担重任，改编《通鉴》，别为义例，创《通鉴纲目》一书。朱熹建立了此书的体例，而实际工作多出于他的学生赵师渊之手。书的特点是：“表岁以首年，因年以著统，大书以提要，而分注以备言”^⑥，有纲有目，纲仿《春秋》，目效《左传》。此书改编《通鉴》自成一统。后世目录学家，有专分出《纲目》体的。元明以后，《通鉴纲目》的地位甚至凌驾于《通鉴》之上。

袁枢（机仲）是另一位改编《通鉴》而创新体的名家，所编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既是改编也是简化，于纪传、编年二体取长补短，把《通鉴》分成二百三十九事，排比次第，详叙始终，“文

①②③④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。

⑤⑥ 朱熹：《资治通鉴纲目序》。

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”^①。此书也是自成一体，后世目录学家，也有专分成《纪事本末》体的。对《通鉴》研究来说，它的作用：一是一本阅读《通鉴》的最好的辅助读物；一是因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全据《通鉴》原文，可用来校勘《通鉴》传刻之误。

注释《通鉴》学者，除上述刘安世曾为《音义》十卷，而世不传外，最早为《通鉴》作注的就是生于北宋元祐末年，卒于南宋孝宗时的四川眉山人史炤（见可）了。史氏积十年之功而成《通鉴释文》三十卷。到南宋末年，行于世的注释本还有刻于海陵郡斋的“公休本”和广都“费氏本”（号为龙爪《通鉴》），据胡三省考证，“海陵《释文》、龙爪《注》，大同而小异，皆蹈袭史炤也。”^②而所谓“公休本”实际是托司马康之名的伪本。

史炤的《通鉴释文》主要是解字和注音。南宋冯时行作《资治通鉴释文序》称：“凡可精索而粗用，深探而约见……为后学垂益于无穷。”当时流行于世。但毕竟浅陋粗疏，待胡三省作《资治通鉴释文辩误》十二卷，纠其讹误，此书遂微。但是后人评论史氏《释文》与胡氏《音注》时，认为史氏精于小学，胡氏长于地理，胡氏仍袭史氏成果不少，所以史炤仍不失注《通鉴》而有贡献的学者。

王应麟（伯厚）作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十四卷，是最早注释《通鉴》地理的著作。由于《通鉴》所载地名之沿革异同十分纷杂，又兼险要阻塞之处措置得失，也是统治阶级所当借鉴的，有王氏之书各为条例，给研读《通鉴》者带来很大的方便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“征引浩博，考核明确，而叙列朝分据战攻，尤

①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“书教”。

② 胡三省：《通鉴释文辩误后序》。

——得其要领，于史学最为有功。”但是，此书实际上并非专释《通鉴》，而是综合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通典》，泛考古今地理，因此又可将其作为一本军事地理专著来读。王应麟另有《通鉴答问》五卷，与《通鉴地理通释》专作考据不同，完全是就事议论，发表史观。此书至西汉宣、元而止，实为未成之书。虽然名为《通鉴答问》。而所论出入于《通鉴》和《通鉴纲目》之间。由于其书是附于《玉海》之后，又与王应麟所作它书以考据见长的风格不同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疑为其孙刻《玉海》时所伪作。

注释《通鉴》成就最突出、影响最大的是宋末元初的胡三省（身之）。胡三省入元不仕，以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，用三十年之功，颠沛兵荒马乱之间，三失其稿，写成与《通鉴》字数大约相仿的《资治通鉴音注》。开始，他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之例，作《广注》九十七卷，以纠正、补充史炤的《通鉴释文》，又有“论”十篇。稿失之后，始以《考异》和所作《音注》散入《通鉴》正文之下。胡三省除了高度评价《通鉴》的作用（已如前述）外，对《通鉴》内容的博大精深也极力推崇。他说：“温公作《通鉴》，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，至于礼乐、历数、天文、地理，尤致其详。读《通鉴》者如饮河之鼠，各充其量而已。”^①他对《通鉴》编修时广采博收、分工合作、集体创作也赞佩备至。他说：“温公偏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挾随幽隐，荟粹为书，劳矣。而修书分属，汉则刘歆，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，唐则范祖禹，各因其所长属之，皆天下选也……岂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！”^②他虽然推崇《通鉴》，但并不象某些解经者那

①② 《资治通鉴》“唐纪·开元十二年注”。

样，一味回护，只求附合，而是既见其长，又明其阙，他把纠举其失，视为自己当然的职责，正因如此，《音注》就更具不朽的价值了。

《音注》的价值，主要是：

（一）不单解释，实兼校注。胡氏所用本，以元兴文署本为主，凡书中错误他都为之校正。

（二）对《通鉴》所载有关典章、制度、音韵、训诂，都有详细注解，特别是对官制、地理，考证更为精详。他在《通鉴释文辨误》中说：“晋宋齐梁陈之疆里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胡氏这一学说“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。”清人钱大昕等说胡氏是地理考据家，其实是不全面的，《音注》一书与《通鉴》一样，同样是“体大思精”之作。

（三）胡三省《音注》中的字里行间都充满民族感情，注中不时发出“呜呼痛哉”“天乎人乎”的感慨。胡氏原有“十论”，今已不可见，但在注中还可散见。

（四）胡注为了便利读者，遇到牵涉上年的事，必注明事见某年某卷，涉及到后来的，也注明为某事张本，政治上的特殊人物一出现，必注明某人事始此。

（五）胡注中所引用的书，今天已有许多见不到，由于胡氏标明了引用的书目，故可以作为辑佚之用。

胡注征摭既广，不免偶有疏失，明清人多所订正。但以胡注中的疵点来否定胡注的价值是完全不对的。

对胡三省思想和他在《通鉴》学上的贡献，元明清以来人们并未了解，而是长期被埋没着。抗日战争末期史学前辈陈垣先生著《通鉴胡注表微》才使其爱国思想和学术成就大白于天下。

胡三省另有《通鉴释文辨误》十二卷单行本，可与《音注》结合阅读。

南宋一代研究《通鉴》的学者还有许多。洪迈（景卢）《容斋随笔》曾批评《通鉴》年号以后来为定，颇有窒而不通之处；晋宋诸胡封建除拜，纤悉必书，皆无关于社稷治礼。王应麟除著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外，所著《困学纪闻》有“考史”两卷，议论涉及《通鉴》方面的，凡十一条，褒贬互有，得失并见。胡寅（明仲、号致堂）著《读史管见》指出《通鉴》事虽备，而立议少，实际是用《春秋》之旨。高似孙（续古）所著《纬略》四卷，列出《通鉴》参据书目二百二十六种，颇有益于《通鉴》研究。

元明两代《通鉴》研究，不如南宋那样热烈，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被人为地抬高了，《通鉴》的地位被压低了。尽管如此，也仍然有一批治《通鉴》的大家涌现，从时间上说，元初和明末是元明两代《通鉴》研究成果较显著的时期。元初有些学者是由宋入元的，他们一方面继承南宋研究《通鉴》的余绪，另一方面，他们把《通鉴》研究做为抒发爱国之情的手段。明末社会矛盾激化，朱氏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、满族入关的双重打击下灭亡。那种政治形势刺痛着许多学者的心，他们也企图借助《通鉴》来寻求医国治民的办法。从历史上看，凡当新旧政权更替或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，往往也是研究《通鉴》兴盛的时候。元明两代的《通鉴》研究，可分为两大支：一支是续《通鉴》学者，一支是订补《通鉴》学者。

续《通鉴》学者又可分为续前、续后、别续三类。

续前：

司马光认为“经不可续”^①，因而《通鉴》不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事。既然称《通鉴》，只从周威烈二十三年开始。当

① 刘恕：《通鉴外纪后序》。

时，人们感到是一个缺陷。为此，刘恕曾做《通鉴外纪》十卷以续前。但是，对《通鉴外纪》这部书，宋末元初的金履祥（吉父）很不满意，他批评说：“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，是非谬于圣人，不足传信”，^①于是以《尚书》为主，兼及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旧史诸子，断自唐尧以下，接于《通鉴》之前，而作《通鉴前编》十八卷。但是，《通鉴前编》名为前续，由于它以《春秋》笔削为意，重褒贬，不重客观史实，所以大失《通鉴》本意，而与《通鉴纲目》倒接近起来，所以明末《通鉴》学者陈仁锡干脆将《通鉴前编》改名为《纲目前编》，冠于朱书之前。该书对《通鉴》研究来说，其价值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。学《通鉴》而又失《通鉴》本意，金履祥可谓始作俑者。

续后：

元明两代，后续《通鉴》之书，主要有薛应旂（仲常）著《宋元资治通鉴》一百五十七卷，王宗沐（新甫）著《宋元资治通鉴》六十四卷。两人同为嘉靖间进士，各自续《通鉴》而不相知。二书志在继承《通鉴》家法，但是名不符实，清人章学诚讥其“于辽、金正史束而不观，仅据宋人纪事之书，略及辽金继世年月，其为荒陋不待言矣。”^②薛氏之书惟详道学宗派，王氏之书取资又贫于薛，所以二书皆不为后人所重。

别续：

我们这里所说的别续是指续《通鉴纲目》和续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之作。

续《通鉴纲目》除有明陈仁锡对金履祥的《通鉴前编》稍变条理改名《纲目前编》外（后来南轩亦就是书加以改纂，名为

^① 脱脱：《元史》本传。

^②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“代毕制军与钱辛楣官詹论续鉴书”。